

黄炎培与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思想比较

乔文博

(河北师范大学 050024)

摘要:黄炎培和凯兴斯泰纳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在职业教育界享有盛誉的大师级人物,在职业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世人所称颂。本文从比较的角度出发,对二者的职业教育思想进行研究,既着眼于理论层面,又着眼于实践层面;既研究二者的相同点,又研究二者的差异;还对造成二者差异的原因进行探析,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实践的理性和自觉程度。

关键词:黄炎培;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思想;比较

黄炎培(1878-1965),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是我国著名职业教育家、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领导人。由他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是我国近代第一个以提倡、研究、试验和推广职业教育为宗旨的教育团体。

乔治·凯兴斯泰纳(1854-1932)是德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家、改革家,公民教育、劳作学校和职业技术教育运动的倡导人之一,被称为德国“职业学校之父”。其职业教育思想主要包括公民教育理论、劳作教育思想、补习教育等三个方面。

一、黄炎培与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思想相似之处

(一)二者均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人,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声誉和影响的教育家。无论是1915年黄炎培的美国考察之行,还是1919年杜威的中国之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论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黄炎培本人并没有简单地照搬杜威的理论,而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对杜威的理论进行重新审视,有选择性地接受,并且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检验其可操作性,不断总结和完善,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在旅美回来后,他在总结清末实业教育的经验教训时说,实业教育之所以流于形式在于学校与社会的脱离、教育与职业的分隔。为此,黄炎培提议将“实业教育”改为“职业教育”^[1]。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的本质是职业性和社会性。

“凯兴斯泰纳的教育理论受杜威的教育思想、价值与文化哲学思想的影响极深。他强调指出,教育通过文化财富进行,而文化财富必须与学生的身心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个人精神结构相一致。”^[2]凯兴斯泰纳不断地学习钻他人的文化成果,并以此为基础,推陈出新,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创设的劳作学校实验,不仅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思想之上,所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深刻地影响了凯兴斯泰纳。^[3]

(二)职业教育平民化

黄炎培认为,发展职业教育不仅仅要为国家、社会增进生产力,使物资丰富,还要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从求职者方面立足,解决广大人民的生计问题、就业问题。他认为,“中国最大、最重要、最困难、最迫切解决的是人民的生计问题。”^[4]所以,教育的重心在民众,在于直接为民众谋利益。出于对职业教育本质特性及其目的、宗旨的深刻认识与把握,他提出,要推广平民教育,主要从他们生计问题上着手,要解决一切平民问题,主要从职业教育着手。因此,他一直坚持将“应收寒素子弟求学,费用务使减轻”作为职业学校的招生原则。

凯兴斯泰纳提倡的职业教育主要是针对下层人民,他所创办的劳作学校即是专指为劳动者子女开办的国民学校,由此可见其职业教育思想的平民化倾向。在他看来,国民小学主要是用来对学生进行公民训练和劳动训练,以便培养“有用的国家公民”。凯兴斯泰纳极力主张对不同阶级施以不同的教育:在为广大劳动人民子女设立的国民学校里,应注重体力锻炼,实施职业教育,以便于学生将来从事体力劳动;而在为少数特权阶级子女服务的中学,却不应该强调劳动训练,只宜侧重智力教育。可见,凯兴斯泰纳的职业教育平民化思想在他所维护的双轨制教育制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黄炎培认为,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学校与社会缺乏联系与沟

通,社会的需要在学校没有反映,学校教育脱离生产和生活实际,知识与实践脱节。^[5]因此,黄炎培强调学校教育必须活用各种知识技能于实地,学工的要到工厂去实践,学农的要到田园去实践,学商的要到商场去实践。要“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7]。他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此种境地,需要手脑并用。”^[8]他提出“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作为职业教育最基本的教学原则。

凯兴斯泰纳也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协调发展。他认为:“如果在儿童整个成长时期,体力和手工劳动多于脑力劳动,特别是在儿童3岁到14岁这一成长期时,如果手工劳动能力的培养和活动,占有绝对首要位置时,则说明,这样的学校办得更加糟糕。”^[9]由此而知,专门的劳作课虽为劳作学校的特色,但这并不表示理论教学就可以完全忽视。如果理论课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样的学校也就不能称为“劳作学校”。凯兴斯泰纳认为,“精神能耐的发展与体力能力的发展,在科目教学中,愈能密切联络,那学校的组织也愈幸福,愈完善,而精神能耐的发展,也更自然更容易。”^[10]

二、黄炎培与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思想相异之处

(一)职业教育目的

黄炎培先生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中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一为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11]二十年代后,又提出把“谋个性之发展”列为职业教育的首要目的,最终提炼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12]。此后几十年里,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他对职业教育的定义、目的作过许多说明。在这些经典表述中,黄炎培回答了何为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为谁而办的问题。黄炎培在阐述职业教育概念时明确指出:“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发展其能力,同时尽其对群之服务,此种教育名曰职业教育。”^[13]

公民教育是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他强调教育应当为国家服务,把每个国民陶冶成为对国家有用的公民。在他看来,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许多重大问题与教育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除非公民受到良好的教育,否则国家的许多政治经济问题也不能解决。”^[14]凯兴斯泰纳明确地提出:“国家公立学校的目的——也就是教育的目的——是教育有用的国家公民。”^[15]公民教育是目的,职业教育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劳作学校是实施公民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场所,从而把职业教育纳入到他的公民教育系统里。

(二)职业教育形式

在黄炎培看来,职业教育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较长期、较系统地传授知识与技能的职业学校,又有为马上要去就业或为已经就业的人们进行的补习教育。他说:“吾们向来办职业教育事业,其主要内容就是办职业学校。后来发现了许多实际问题,并非职业学校所能解决,于是又办职业指导、职业补习教育。实践得久而久之,也就成了职业教育内涵是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的三分说。”^[16]为了满足当时社会的各种需要,后来,黄炎培又提出了其他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如灾民职业教育、流浪儿童职业教育、伤兵员职业教育、裁兵后职业教育等等。

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形式有劳作学校和补习学校两种。他明确提出,公民教育应把国家“所有的分子”都包括在内。所谓“所有”(下转第56页)

(上接第 53 页)

的分子”，自然包含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即全体国民。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凯兴斯泰纳坚决地反对“学校的垄断”，认为只对某一阶级作出教育上的安排而不考虑其余的阶级，乃是“一个极大的错误”^[17]。在凯兴斯泰纳看来，彻底普及初等教育，对全体国民进行公民教育，是使他们能够履行国家义务的基本前提，但是如果把公民教育仅仅局限于初等教育水平，又是不够的。^[18]鉴于这一状况，凯兴斯泰纳提出按照公民教育的目标和劳作教育的原则来改革国民学校，同时在城乡广泛地设立新型补习学校，作为全面实施公民教育的两大教育体系，即开展职业教育的两种形式。

(三) 职业道德的培养

注重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是黄炎培职业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把职业道德教育概括为：敬业乐群、劳工神圣和爱国主义。黄炎培主张的职业道德规范为“敬业乐群”，所谓“敬业”，指“对所习之职业具有嗜好心，所会之事业具有责任心”。即敬重其所从事的职业，充分理解其社会价值与社会意义，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所谓“乐群”，指“具优美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

凯兴斯泰纳也认为职业教育的重点之一是对学习者道德品质的培养。职业学校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技能，还要培养国家所要求的道德品质。在凯兴斯泰纳看来，仅仅具有职业技能，并不足以真正培养对国家有用的公民，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使年轻一代具有一切为国家的道德品质，使学生理解国家团体的大义，领会国家的最高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使之在未来所承担的职务和工作中做到尽善尽美，这也就是职业训练和团体生活的伦理化。

很显然，二者都重视职业道德的培养。但黄炎培认为之所以要培养职业道德，是因为职业教育增加了物质财富，个人道德情操也应健全发展。凯兴斯泰纳提倡道德教育是为了要求学生俯首听命于统治者。二者的道德教育亦有本质的区别。

三、结语

综上所述，黄炎培和凯兴斯泰纳的思想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它们都符合当时的需要，对当今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的“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体现了黄炎培

先生的精神，也是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与个人发展需要有机结合的具体体现，是当前的职业教育改革以及发展时代的特征。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显示了他们思想的价值，更需要我们对他们的职业教育思想进行比较和探索，以促进当今教育的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 [1]吴学敏.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重要贡献[J].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1):57-60.
 - [2]凯兴斯泰纳教育思想评介.凯兴斯泰纳教育论著选[M].郑惠卿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3.
 - [3][9][14]凯兴斯泰纳.劳作学校要义[M].刘钧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5.
 - [4]唐永泽.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评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3.
 - [5]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宣言书[J].职业与教育,1917(1).
 - [6]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101.
 - [7]黄炎培.河车记[J].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4号.
 - [8]凯兴斯泰纳.凯兴斯泰纳教育论著选[M].郑惠卿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0.
 - [10]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70.
 - [11]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284.
 - [12]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校黄炎培教育思想研究中心.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评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4.
 - [13][16][17]Georg Kerschensteiner.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M].Translated by A.J.Pressland. London: George G. Harrap Company,1912.
 - [15]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48.
- 作者简介：乔文博（1996-），女，河北辛集人，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省职业教育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